

静安先生史席开
 先生曾一至天津正襟奉谒时已席
 京帐甚得吴君书和
 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玉慰 考试命题
 事标中而推前以正安 为国家中
 人遂行此一句内断烦授不能用心
 校内学以乞

静安先生史席开
 本校最久 人植忠厚 正安中承其未风治
 教者有先生之托也 固以之有相与根植
 二名中任以人者教者亦多可赞其德
 可赞其德以正安才疏或正安更甚耳 以要
 静安持正不党席吴君能代表也 静安正
 正行何如 此致

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

古心人学理论研究

第四十二辑

华东师范大

胡晓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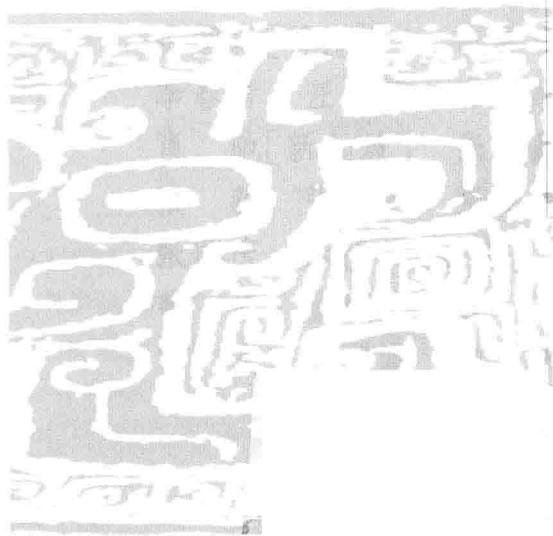
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四十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胡晓明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4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42)
ISBN 978-7-5675-5088-9

I. ①作…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626 号

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二辑

主 编 胡晓明
责任编辑 陈庆生
封面设计 高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088-9/I·1518
定 价 40.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胡晓明

编辑部 彭国忠(主任) 杨 焄 赵厚均
韩立平

编 委 (依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军	齐森华	兴膳宏	[日本]
宇文所安	[美国]	朱良志	朱杰人
朱晓海	[台湾]	陈文新	
陈国球	[香港]	李建中	
李春青	汪涌豪	许 结	
肖 驰	[新加坡]	张 晶	
张 毅	张少康	张伯伟	
张国庆	张隆溪	[香港]	
曹 旭	曹顺庆	黄 霖	蒋 凡
蒋 寅	蒋述卓	谭 帆	

编辑部报告

最近参加港台大陆学者的一场小型研讨会。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以学术进路而论，发表论文的学者似大致可分成了“造高楼的”与“掘隧道的”两个类型，前者是以辛苦建构“抒情传统”宏大理论为旨趣的海外阵营，后者是乐而忘返地以发现或挖掘古典文献本身奥秘为旨趣的各路英雄。前者好像是在建造一幢永远未能完成的高楼，高楼又峭立又幽深，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其中全部的秘密。后者似乎不断进行学术隧道的深入掘进，让我们穿越时光，进入古代思想与文献的复杂地层，如探照灯一样洞微烛幽，如采矿工式似的采集丰富的原生矿石，后者刻抉入里的功夫，前者俯仰古今的观照，都是极为精彩的。然而我们仍对两者都有一些不满足与困惑：首先，正如将所有的文学现象都论述为“抒情”，好像将所有的人间风景都从大楼里的一个窗口看出去，风景会不会有流于稀薄与单调之弊？其次，抒情传统只看见自身而不见其他传统，正好比一个人在高楼上观风景，望断天涯，满目荒凉，顾影自怜的样子，是不是有些自恋与自大？同样，学术隧道的挖掘让我们远离世间，不接地气，越来越深入古典遗产的过程、变成精深的专家的同时，也是越来越离开理论思想的进程，也就越来越将古典作为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遗产与古董。当然，抒情传统的论述毕竟是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最有理论创造力与解释力的一项论述，它确实能将众多纷杂的现象整理为一套言之成理的系统，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以容纳新的不同论述。而古典学地层的深描也自成一大学术风景，不因理论力的疲弱而失去其魅力。因而，两者的存在十分重要的，其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亦乐观其成。

但是,学术隧道的一味掘进与思想大厦的风景独好,成为当今学术景观的二元地标,毕竟还是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多元开放、活跃的思想。学术界其实不断有这样的批评声音:“古代文论如果仅仅成为古代研究的对象,而非当代批评的一种参照,那是一种缺失。”“好的批评与研究,不都是一时一地的,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消化着过去,而且影响着未来。古代文论在当代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召唤出来。”(孙郁《我们应如何运用古代文论的遗产》,《文艺争鸣》2015.08)我们能否在掘隧道与造大厦的同时,也更多一点开放性与当代性,更多介入现代思想文化的活动,更多一些解读与建构的能力。像前辈如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徐复观、钱穆、王元化那样,既不是以古释古,又不是以一驭万,关注思想而置根传统,发挥理论而不尚空谈,真正表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中国智慧、中国声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交出属于我们时代的一份中国文论的答卷,仍需大家一起来努力。二〇一五年底,编辑部与安徽大学联合举办“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高层论坛,讨论热烈,本期刊发其中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反映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新思路。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梅运生、陈伯海两位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文论的研究,成果丰硕,老而弥坚。本期刊发梅运生先生的《情感、美感与诗的审美价值——梁启超后期诗论述评之一》,论述梁启超一九一九后直至去世的最后十年间,其诗论从戊戌变法时期要求新诗用新的精神思想创造新意境,转变为侧重于情感、美感与审美价值。陈伯海先生于二〇一五年迎来八十华诞,上海举行了“历史传统与现代语境——《陈伯海文集》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本期特辟“学人志”专栏,撷发陈伯海先生《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我的探索之路》,及董乃斌、蒋凡、祁志祥、查清华四位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以资庆贺与纪念。

中国文论的海外翻译及研究,是我们一贯的关注点。本期刊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凤琼的文章《〈文赋〉在美国:从方志彤到麦克雷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者方志彤的《文赋》英译、方志彤与

麦克雷什的互动以及麦克雷什对《文赋》的评论,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参与。

今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讨会,将于十月份召开,会议由汕头大学承办,主议题为“中国智慧与中国文论的再认识”,希望广大会员积极参与讨论。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三月

目 录

编辑部报告	(1)
-------------	-------

◆ 特 稿 ◆

情感、美感与诗的审美价值

——梁启超后期诗论述评之一	梅运生(1)
---------------------	----------

《文赋》在美国：从方志彤到麦克雷什	李凤琼(17)
-------------------------	-----------

◆ 专 题 ◆

“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高层论坛专题讨论	(31)
-----------------------------	--------

论古代文论研究的困境与新机遇	顾祖钊(49)
----------------------	-----------

◆ 经 学 与 文 论 ◆

尚书中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	张思齐(60)
--------------------	-----------

论孔颖达经学美学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常 清 乔东义(80)
------------------------	---------------

“体用”论文化视域下的古典诗歌创作论

——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例	黄贞权(116)
----------------------	------------

◆ 历 代 文 论 ◆

《文心雕龙》“化感”的内涵及其表达的理念	赵 华(135)
----------------------------	------------

谢朓“圆美流转如弹丸”诗学观念考论	陈海燕(145)
-------------------------	------------

高适诗论发微	魏景波 魏耕原(157)
--------------	----------------

论皎然的“文体四变”说	褚为强(174)
-------------------	------------

黄庭坚“高妙”读词考论

- 兼论苏轼《卜算子》的宋代阐释史 韩立平(187)
- 从“诗性”阐释到“自性”发掘：明代词论的尊体之说 刘劲松(201)
- 明前期台阁文人诗歌本体论与功用论 汤志波(223)
- 宋征璧词学理论批评开新质素辨说 莫立民(241)
- 转益多师，骚雅为骨与蒋春霖词的艺术追求 杨柏岭(252)
- 《人间词话》的四种读法 叶帮义(275)
- 马一浮晚年诗歌的美刺精神 刘 炜(291)

◆ 文学史视野 ◆

- 羞见时节盛：韩愈厌春情绪的思想内涵探析 周 游(308)
- 论江南出井《心史》是中华民族一部“经” 陈福康(321)
- 论雷峰塔之倒掉与文化意象之歧义 曾庆雨(330)
- “泸戎一经少陵擘，至今传诵轻红句”
——“轻红”一词的文学历程 赵军伟(344)

◆ 学 人 志 ◆

-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我的探索之路 陈伯海(353)
- 陈伯海先生学术贡献的意义——为陈伯海先生八十寿辰及《文集》
出版而作 董乃斌(362)
- 陈伯海先生及其唐诗学研究 蒋 凡(373)
- 本色是书生，立意在创新——略谈陈伯海先生的为人为学
特点 祁志祥(379)
- 眼光与方法：唐诗学建设工程 查清华(386)

◆ 文 献 ◆

- 晚清民国词话两种 和希林(396)
- 周瘦鹃的《绿萝芜馆诗话(附词话)》 王 静 王 贺(407)

情感、美感与诗的审美价值

——梁启超后期诗论述评之一

梅运生

梁启超后期的诗论,与戊戌变法时期的诗论是有显著差别的。这里所说的后期,是指从一九一九年到他逝世为止的最后十年。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曾致力于“诗界革命”,写作新诗,要求新诗用新的精神思想创造出新的意境,用此以新国民,为当时的政治维新运动服务。其评论的主要对象是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等维新派的诗作。而后期的诗论,则是侧重研究屈原、杜甫等古代名家诗歌的美感和审美价值问题,兼及表情达意的技巧。意在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进行美感教育,用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国民的精神生活。梁氏诗论的转变,是与他研究学术文化的指导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本文将寻绎其变化的历程,并对他的以“情感”说为中心的诗的审美理论,作一番研究。

一 学术文化思想的转变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西游欧洲,对大战后的欧洲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学术文化作了一番实地的考察,历时一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他在伦敦给二弟梁启勋写了一封长信,谈及欧游中的感受。

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

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顾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与仲弟书》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880—881页）

欧游后的梁启超，其“内部心灵界”发生哪些变化呢？从他后期的言行看，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在政治上由积极从政到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专务教育和学术活动，但其学术活动还是有其政治意图的；二、在对东西方学术文化的去取上，由侧重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到侧重提倡东方学术文化，特别重在提倡本国文化；三、在哲学观点上，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四、在诗歌理论上，由大力提倡写作新诗到致力于研究古诗。概括起来说，其主要变化集中于两点，即由政治启蒙为文化启蒙，由重理转为重情。现就其政治和学术文化思想的变化情况作点说明。梁启超在政治上遭到一系列的失败后，精神上异常苦闷。他西游欧洲，本想从他所向往的地方吸取思想养料，寻求新的解救药方。入欧以后，目睹大战后的欧洲一片残破和败落的景象，亲自了解到当时欧洲学术文化界思想上的混乱和精神上的彷徨，对当时笼罩全欧的世纪末的悲哀有深切的感受。这就使他对过去曾倾心过后的欧洲人权、民主等思想的价值和作用，产生了怀疑，对于通过走维新政治来改革社会的道路，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想另求新的出路。《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说：“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我们又须知，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完成呢！”在他看来，欧洲的精神文明已接近破产，必须用东方的古代文明去补助它。因此，他要求中国的学者和中国青年，“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要多多增进研究国学的兴趣，发扬中国文化的好传统，以补救世界文明的欠缺。过去，他

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亡友夏穗卿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用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欧文学作比较，说明中国即使是最好的诗歌，也是“精深盘郁雄伟博励之气，尚未足也。”多次批评薄今爱古、重中轻外的倾向。现在他又说：“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批评那些“沈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所以他的学术研究的重点，就从侧重于介绍西方文明转而侧重于研讨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明，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就是他后期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

梁启超的学术文化思想之所以发生了如此大的转折，其主要原因就是目睹十八世纪以来欧洲物质文明的昌盛精神文明却日益衰退以至于堕落的现实，并且作了一种错误的解释所致。在梁启超看来，欧洲的科学发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盛行，给欧洲带来了物质文明，但是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科学，就为强者剿灭弱者提供理论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侵略弱小和互相争夺，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是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恶果。另外，西欧盛行的以自己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学说，至尼采而达到极点。爱他主义反被认为是奴隶道德，而“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欧游心影录节录》）梁氏认为这些怪论，都是以进化论做根基，假科学之名而盛行。生存竞争和弱肉强食成为人们生活的信条，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就必然不可避免。而这种所谓客观科学反射到文学上，就是自然主义文学得势。自然主义的文学对这样的社会和人类心理作了极冷酷的解剖，把社会丑恶的东西和人类兽性方面和盘托出，弄得大家满脑子怀疑和满脑子失望。梁氏认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如果跟着欧洲学习，就必然重蹈复辙：“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熟甚！”（《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梁启超确实看到了社会达尔主义和尼采学说对社会思想的严重毒害，但他无法分析其成因，只好从当时正在兴起的占晤士的人格唯

心论和格柏森的直觉创化论中寻找改良主义的新药方。人格唯心论和直觉创化论都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都以进化原则为立足点,从人的精神作用说明社会进化的道理,是社会进化论的另一种学派。所谓人格唯心论的“人格”二字,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自己”的一个通名,是以各个“自己”为主体又和别人相联系并受别人影响的一个化合物。“人格是个共通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欧游心影录节录》)人格唯心论的信奉者把当时种种社会罪恶都归之于人们精神品质上出了问题,要求人人修身厉行完善人格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梁启超也想遵循这条途径来砥砺人们的精神,完善中国人的人格,借以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

至于直觉创化论对梁氏的影响就更为巨大了。他在《与仲弟书》中说:“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格柏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先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梁氏说格柏森是他“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而格柏森则称赞梁启超等“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所以他们“一见皆成良友,最是快也。”可见他对格柏森哲学思想的倾心。格柏森的直觉创化论,依照梁氏的解释:“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世界实相,又知道变化流转的权操之在我,自然可以得个大无畏,一味努力前进便了。”(《欧游心影录节录》)梁氏认为这种学说,能给主观奋斗者以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可以“转移一代人心”,是医治当时社会思想流弊的最好的精神药方,“这些见地,能够把种种怀疑失望,一扫而空,给人类一服‘丈夫再造散’。”这剂“丈夫再造散”,梁氏还想用宋明的心学,印度的佛学和中国古典诗学加以补充,使之更为完善,以此来解救中

国人的精神危机。

直觉创化论者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人类主观意识直觉创化出来的,是内省体验的结果,所以礼赞“心力”,认为“心力”可以创造一切,改变一切,是彻底的主观唯心论者,当然是非科学的。梁启超信奉格柏森哲学,就否定了他前期所遵循的哲学。前期的梁启超,是个客观唯心论者,一八九九年,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说:“爰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斯物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元气。”这种“元气”,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精神,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也不是主体所能直接创造出来的。但它可以注入和充实于主体之中,改变主体的面貌。现在梁氏信奉格柏森学说了,认为人类的意识流转就是世界的实相,这种意识流转不是外在精神决定的,而是主观直觉内省体验的结果,操纵之权完全在我。这样,梁氏的哲学思想从客观唯心论彻底转变为主观唯心论了。

作为一个唯心论者,梁氏一生都很重视精神作用。前期他所强调的精神,重在理念,重在精神思想^①。他在倡导“诗界革命”时,强调要“革其精神”,要求用西方的新思想充实诗歌内容,形成新的意境。后期所说的精神,重在内省体验,重在情感,重视诗的美感和审美价值,想借助诗情来陶冶人们的性情,完善人们的人格。

后期的梁启超,在政治上是倒退了,是时代的落伍者。他的政治观点有许多是落后的,失去了前期那种站在时代前列的政治鲜明性。但是,他在通过改造人们的精神品质来改造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在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上,却投以极大的热情,用了全部的精力,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对中国古典诗歌诗艺美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评价梁启超后期

^①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第三年(1901)时,曾写过《自励》诗二首,其一曰:“献身甘作族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这首诗表明他那时的决心,要继续宣传民权、民主、自由等新思想,并以此来改造旧中国。对此,他既很自负,也很自信。

的诗论,当然不能忽视他在政治上的落后性,但是把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等同起来,因为其政治观点的原则错误而完全否定他在诗歌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一时期,梁启超在理论上和文学活动上也都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成绩。”(《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载《光明日报》1960年9月25日)这样的评判,是不公允的。

二 情感的作用与审美教育

梁启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特别有兴趣,是与对情感作用的重视分不开的。欧游后的梁启超,有鉴于西方思想界主智未能解决人生问题,反而使人们精神苦闷,彷徨而不知所措,便由侧重主智转而侧重主情^①。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情感的作用大于理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智来引导人……有时所知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他又从人生的意义上说明情感的作用大于理智,“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梁启超把精神区分为情感和理智两大类,强调情感的巨大感染作用,认为情感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原动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情感作为一种主要心理因素,它对其他心理因素起着诱发和推动作用。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① 前期的梁启超,也认识到文艺的“入人”“感人”的情感作用,但在思想却更为重视理性的精神力量。譬如他在1901年所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谈到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的作用,这四种力,实质上都是在情感上起作用。但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却重在要求写出能灌输新思想的新小说。他自己那时所写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不是重在言情,而是重在说理。“兹编之作梁欲发表区区政见。”(《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足见其重理胜于重情。这和他倡导“诗界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是“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誓言的具体实施。这和他后期强调情感作用大于理智的观点,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与元九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梁启超在强调情感作用时，似乎又有点唯情非理的味道，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点偏颇。从心理学上看，理智的因素是经常对情感的因素起调节和制约作用的。当情感和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智的制约，常常是很必要的。就审美心理说，固然侧重于情感，但也渗透着思想，任何审美判断离开思想都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情感的作用固然很大，理智的作用也丝毫不能轻视。在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有着情志合一的审美判断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家积累了长期的审美经验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当然情志论的“志”是情感化的思想，是融化在情感之中，而非游离于情感之外的。从梁启超所分析的情感的性质，赞赏古代名家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优美与高尚，以及重视情感的教育等问题看，他所说的情感，仍是包含有若干思想内容，并非和理智完全绝缘的。

再就情感和美的关系说，梁启超认为美是情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情感是产生美的源泉，“情感表达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人生观与科学》）就“爱”和“美”的关系说，“爱”是“美”所派生出来的情感，人们之所以“爱”，就是因为其“美”，它是和美相依存的。所以梁启超特别重视探讨审美的情感，强调其在生活上的价值。他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专在美与生活的关系上做文章：“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这句话虽然不敢说把生活全内容包举无遗，最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也活不下去。”梁氏所说的趣味生活，包含有好几项内容，如劳动、游戏和做学问等，而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可见趣味就是审美的愉悦感受。梁氏所说的“趣味

便是生活”，“没趣便不成生活”，也就是说在人类生活中，没有美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审美的乐处，生活也就失去了光彩和意义。

综观梁启超关于情感和美的来源的论述，他所作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他把情感和美的产生神秘化了。这方面他显然是受了格柏森哲学的影响，认为情感和美都是主观直觉创化出来的，是内省体验的结果，所以既神圣又神秘。但是当他谈到情感的作用和审美的价值时，又紧紧地联系着生活，强调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是推动人类生活前进的强大的动力，把审美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虽不无夸大之词，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审美经验的科学总结。此外，我们对梁氏的审美理论和审美实践，也还要仔细地进行对照并加以分辨。从中可以发现到一种矛盾的现象：当他谈到情感和美的产生时，总是强调其神秘性、不可捉摸性和非科学性；但是当他进行具体的审美实践时，又很重视外物对情感的触发作用。譬如他在探讨文学艺术的趣味来源时，认为“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又如他在分析和赞赏屈原、杜甫等名家诗歌的优美情感时，又总是联系着他们的生活遭际。这是梁氏在从事学术活动中重视科学态度产生的结果，梁启超在审美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的矛盾，大概也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学风突破世界观局限又一实例吧！所以我们对梁氏主观唯心论的批评，也要采取尊重事实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

基于对情感作用的重视，梁启超很慎重地提出了情感教育问题。他说：“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情感，其作用“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坏得可怕。”为了把情感的作用引向好的方向，避免坏的作用，所以情感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认为“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以上引文均见《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